

January 2013

## A Critical Reflection on and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Yichuan W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Wang, Yichuan. 2013. "A Critical Reflection on and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3, (1): pp.62-67.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3/iss1/1>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 百年中国现代文论的反思与建构

王一川

**摘要:**本文是对百余年来中国现代文论的一次批判性反思与建构,提出中国现代文论留下了历史经验:以中化西、以今活古、个群相融、上下通贯、物先于心、思艺共生并侧重思想内容、内在知识制度与外在知识制度保持适度张力。本文认为现代文论还留下偏向思维定势、思先于在定势、过度挪用定势、闭关排外定势、以制抑学定势等教训,进而主张在充分借鉴上述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致力于21世纪中国现代文论独特品格的建构,为此而提出如下对策建议:坚持以中化西的思想路线,弘扬以今活古的思想原则,灵活处理个群关系,加强以雅导俗,既重物质现实而又趣味高远,形式配合思想,知识制度保障学术健康发展。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论 反思与建构 经验与教训 以中化西 以今活古

**作者简介:**王一川,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电子邮箱:wangyichuan@pku.edu.cn

**Title:** A Critical Reflection on and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bstract:** This essay attempts to survey and critically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t summarizes the heritage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n the form of domestic stand that incorporates Western thoughts, modern position that revitalizes Chinese tradition, union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he mass, the priority of material over mind in the symbiosis of thought and art, and the necessary tension between interior intellectual system and exterior ideological institutions.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lso leaves us some lessons to learn, especially such fixations as inclination to dialectic thinking, thinking taking priority over being, over-appropriating, xenophobic self-closing, and suppressing the academic with the institutions, all of which may be fully examined for the purpose of constructing the 21st century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with unique features.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some suggestions that such a construction could be achieved by holding onto the Chinese stand while absorbing Western theories, reviving the ancient through the contemporary, flexible handling of the individual-mass relationship, guiding the popular with the refined, maintaining balanc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terial reality and high taste, between form and thought, and between institutions and academics.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reflection and construction experience and lessons absorbing the Western into the Chinese reviving the ancient through the contemporary

**Author:** Wang Yichuan is a professor and the dean of School of Arts, Peking University, and a research fellow at Centre for Literary The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wangyichuan@pku.edu.cn

如果从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时算起(梁启超1826),中国现代文论已有一百一十多年历史了。现在有必要回头来反思:如何从总体上回顾和评价既往中国现代文论史,以及如何认识它的现在并考虑如何把握它的未来。诚然,有关中国现代文论的质疑与批评声音至今仍不绝于耳,特别是当把它同卓然屹立于世界文论之林的中国古代文论相比时,对它的指责乃至不屑就更是见惯不怪了。但是,应当看到,中国现代文论毕竟是在古代中国从未遭遇的极其特殊而又艰难的新形势

和新条件下创生和发展的,毕竟做出了自身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并且或多或少取得了一些成绩或推进,特别是留下了一些经验和教训。即便是那些教训,也应当成为当前中国现代文论建设需要记取的宝贵财富。因此,现在再来简要地回顾既往百余年来中国现代文论历程,尤其是其中在中西文论对话与汇通中开展中国现代文论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无疑有助于中国现代文论带着对过去的清醒认识而更加务实地走向未来。<sup>①</sup>

## 一、中国现代文论的经验

与那种有关中国现代文论患了“失语症”的断语不同,<sup>②</sup>中国现代文论是在遭遇前所未有的重大文化断裂时,匆忙学步和强行起飞的,并在中西文化及文论的冲突中不懈地探索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其间既留下了自己的牙牙学语印记,也书写了独创的话语断片,更记录下寻找自身独特话语的艰辛历程,从而在其发展进程中留下了一些值得重视的历史经验。对此,可以围绕如下几组关系(远不止此)去概括:中与西、古与今、个与群、上与下、心与物、思与艺、制与学。

首先,在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上,中国现代文论留下了以中化西这一历史经验。以中化西,不是一味地跟从西方文论范本走,而是以中国文学活动自身的现实需要和发展目标去富于主见地化用西方文论资源。现代中国人要追求自己的现代生活、表达自己的现代体验,就需要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提出自己的问题意识,表现在文论领域,就是要以现代历史主体的独立自主姿态去吸收和消化西方文论资源。以中化西,首先需要明确我们要什么。毛泽东文艺思想在中国的成功,正集中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的以中化西的魄力和智慧。回看新时期文论中勃兴的文学审美论,它虽然大量吸收了康德的无功利美学思想,但并没有简单地认同其审美绝对化偏向,而是以注重社会实际关系的中国文论传统去加以化合,满足了新时期面临的拨乱反正、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时代需要。这些以中化西经验突出地表明,中西文论对话与汇通的关键在于以我为主,在于适合现代中国历史主体的新需要。这就使得“我们是谁”、“我们要什么”成为现代文论建设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其次,正是在我们是谁、我们要什么的问题上,中国现代文论遭遇到古代与现代的关系缠绕。对此,既往中国现代文论提供了以今活古的成功范例。以今活古,就是既非厚今薄古、也非厚古薄今,而是以现代自主的和民族的文论建设为基点,去激活和活用古典文论,由此,中国现代文论将为建构中国文明的现代性新传统而添砖加瓦。传统,不等于静止不动的实体,而是一个不断流动的变化与创造过程。中国现代文论的使命,是在现

代中国民族命运这一共同意义上去创造和运用古代文论的各种资源。无论是厚古薄今论者还是厚今薄古论者,之所以在中国现代文论史上都没能留下成功的范例,就是由于都没有将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看作是同一个生死不离的共同体。林纾及学衡派的某些复古思想,对中国现代文论而言,留下的是类似图书馆或资料室的意义。而王国维的“境界”说、宗白华的“艺术意境”说、沈从文的“兴味”说等,之所以能成为值得借鉴的现代文论建设范例,恰是由于它们更加敏锐和准确地捕捉到了现代中国人的彷徨无依的心灵及其审美拯救需要。它们的范本虽然都采自古代,但更代表和满足了现代中国人的内在需要。

再次,同样是在“我们是谁”这个问题上,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成为中国现代文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首先是个体还是归属或附属于集体或群体,这不仅在“五四”时期文论中发生过激烈论争,而且直到新时期文论也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周氏兄弟文论思想之间正是在此问题上显出了差异,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在此也大异其趣。当然,还曾出现过个群关系极度紧张乃至个性被扼杀的时候,例如“文革”时期文论完全陷入“文艺黑线专政论”等政治斗争漩涡中。不过,中国现代文论确实曾有过个群相融的成功经验。个群相融,就是既不是一味地崇尚个人主义,也不是全盘地非个人化,而是把个人或个性诉求同群体或民族的整体需求紧紧相连,达成个体与群体、个人与整体的相互融合。“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运动及其理论建树(胡适、陈独秀、鲁迅等)的成功,正体现了文论家的个性诉求与中华民族在民族危亡关头的群体需求的相互融合。

还有就是,在“我们要什么”的问题上,现代中国的一个基本着眼点在于对民众的关注,具体表现为同时需要上层文学和下层文学,并达成上下通贯、雅俗共赏。这种眼光向下、上下通贯的文学及文论取向,构成中国现代文论区别于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根本特征和重要经验。这主要出现在两个时期: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既有上层为主的文学革命论者(胡适、陈独秀、鲁迅等)在吸纳和改造下层白话文并使之成为现代文学主流方面的成功,又有同样来自上层(顾颉刚、钟敬文等)但渗透到下层的民间歌谣活动的成果;二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延安等地,应社会变革需

要及毛泽东《讲话》感召而出现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解放区文艺活动,及相应的文论与美学建树(赵树理、李季、贺敬之、周扬、周立波、何其芳、王朝闻等)。而到从20世纪九十年代至今的新时期文论时,上层文学与下层文学之间再次出现隔阂,并引发近几年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论争。上与下或雅与俗的交流和碰撞,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文论的知识型构架,出现了中国古代文论所没有的新面貌,从一个侧面强化了现代中国人不同于古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维度。这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论的一个重要传统。

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中国现代文论取得了物先于心的宝贵经验。物先于心,是说在承认物质先于精神或物质决定精神的前提下,承认现实的社会物质生活是文学过程的源泉和基础。这一点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对中国现代文论的一条突出的和基本的贡献。这意味着中国现代文论形成了一种主导性思想传统:文艺发展必须立足于并服务于特定的社会现实。这样,无论是过于注重内心的“新感觉”理论,还是过度政治化和僵化的“文革”时期文论,任何唯心论或脱离中国具体国情的文艺思想,都不可能在现代中国茁壮成长。相反,以鲁迅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论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正是由于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现实沃土,才能在中国现代文论发展史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这使得中国现代文论显示出中国古代文论难以比拟的植根大地的朴实之风,也让西方文论中“新批评”之类孤绝傲世之花无缘在东方结出同样丰硕的果实。

与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相应,在思想与艺术(或思与艺)或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中国现代文论建立了思艺共生并侧重思想内容的审美经验,这具体表现为对思想内容重于艺术形式的自觉追求和维护。这跟中国近现代历史际遇直接相关。过于讲究形式,容易导致忘却现实苦难和抵抗之责。在民族危亡时刻,文论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团结人们共赴国难,而不是流连于个人的浅吟低唱。文学研究会、左翼文论、解放区文艺大众化实践以及建国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之所以能被普遍认可,恰恰是因为它们在注重形式感的同时更加关注民风民俗、社会秩序、道德伦理、政治革命、民族解放等思想内容的创造。它们虽然在艺术上有时显得粗粝,但更加具有现实生活的鲜

活质感和生命热度,更加符合现代中国文学的眼光向下、心系民生疾苦的主流价值需求。

最后,中国现代文论的可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社会知识制度与特定学术发展的协调关系。就此而言,中国现代文论取得的一条经验是:内在知识制度与外在知识制度之间保持适度张力,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学术发展。真正有效的文学制度(建制)应是近乎无形的制度,可以保障文学的自由及其合法性。晚清以来,内在知识制度的逐步确立保证了学者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实现,由此积极推动了文学研究的成熟、现代文论学科的建立及发展;而外在知识制度则借助于国家、执政党的力量,通过学科制度的合法化途径,包括通过设置课程、鼓励出版、立项资助等学术机制,巩固了本来只属于知识共同体内部的制度,减少了文学知识传承的无效劳动,赋予文学知识以合法性。如果这种内在知识制度和外在知识制度之间保持合适的张力,和谐相处,就能为文学理论提供生成空间和生产场所,发挥激励结构的功能,保障和促进文论研究的稳定增长。

以上只是有关中国现代文论历史经验的极简明的概括,其涉及的方面自然远不止于此。但仅仅是从上述方面看,中国现代文论就已经取得了与“失语症”论者的否定性估价绝然相反的丰富成绩,足以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这表明,只要冷静地返回中国现代文论的历史现场去寻觅,就完全可能取得应有的收获。

## 二、中国现代文论的教训

与中国现代文论取得的历史经验相比,它所留下的历史教训可能更加引人注目,从而值得重点关注。下面围绕严重影响其顺利发展的几个较为显明的思维定势或思想症结来加以讨论。

首先要提及的就是偏向思维定势。中国现代文论常常遭遇非此即彼、非西即中、非今即古、非个即群、非上即下、非物即心、非思即艺、以制抑学等极端化思维偏向,相互平衡或协调的思维格局远远少于偏激的思维格局。从“五四”时期的周作人、学衡派到创造社,到建国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观念及“文革”时期文论,再到新时期文学主体论及文化研究热等,或多或少都存在着某种偏向思维,如西化、复古、排外、封闭等偏激思潮,这些

对现代文论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再有就是思先于在定势。中国现代文论源自清末民初启蒙思潮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渴望(林毓生 43),有时过分相信思想或精神层面的力量而遗忘现实的社会存在层面的力量。这一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多元文论范式共生时期及八十年代“美学热”期间,都有着一定程度的表现。超凡脱俗的审美精神如果不牢牢地扎根在现实土壤中,势必陷于缥缈微茫的绝境。

还有过度挪用定势。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虽然有时可以被挪用去充当社会变革的工具,但过度的挪用,例如试图让文学创作直接配合社会革命与建设进程等,必然会导致它成为马克思所批评的那种“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这一点在 20 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的国家文艺管理过程中不时地出现,其深刻教训和惨重代价不能遗忘。文学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特征必须得到尊重,否则,付出的代价比忽略文学还要巨大。

闭关排外定势也不能忽略。同样是在 20 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期间,中国现代文论只被允许模仿苏联文论模式,完全关闭了向世界上其他文论如西方文论学习的窗口。这几乎导致新时期中国人在再次打开眼界时完全丧失自信,并在此后很长时间里心态失衡。现代中国的世界性环境、内部社会变化及文学变革,都不允许中国文论闭门造车。在相互学习和比较中,创造更好更高的文明,这是现代中国应有的胸襟和气魄。

最后是以制抑学定势。在知识制度建立过程中,外在知识制度只应是内在知识制度的结构化和正规化导向,而不能脱离或压制内在知识制度的自主生长要求。如果外在知识制度过分干预或压制内在知识制度的作用,就会以制度去抑制或代替学术本身的常态发展,从而对学术研究造成严重损害,导致学术危机乃至社会危机的爆发。以“文革”时期文论为例,当那时的知识制度中的外在制度严重压抑乃至取消内在制度的自主角色,甚至出现特殊权力集团如“四人帮”完全凌驾于文论学术共同体及其学术自主性之上时,知识制度就丧失掉制衡与更新的活力,不合理地阻碍了文论领域的学术自律,从而对文论发展起到了遏制乃至扼杀的作用。这样的教训十分惨痛。

### 三、中国现代文论的当前问题

要看到,进入 21 世纪的中国现代文论,不仅是携带着上述历史经验和教训来的,而且更要面临新形势下文学与文论变革的新挑战。总体来看,中国现代文论建设在当前面临以下几方面的突出问题。

第一,以中化西的经验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和消化。盲目模仿西方文论范本而忽视中国文论传统的偏向,不仅在整个新时期 30 年里没有得到根本扭转,而且在今天仍在持续。虽然许多学者致力于中国现代文论建设并取得可喜的成绩,但无论是 20 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方法论”热,还是九十年代初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流行,抑或 21 世纪初“文化研究”的引进,都不同程度地染上了“食洋不化”的症候。不加区分地用西方文论思路和方法硬套中国文学和文化现象,这种做法根本上缺乏对现代中国基本特征的认识,会严重影响中国现代文论建设脚步。

第二,复古偏向仍然有其萌生的土壤。中国现代文论诚然可以求助于古代文论遗产,但却不能因此而偏激地主张彻底回到古代文论。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存在联系,但更存在差异。无论是有关中国现代文论患“失语症”的责难,还是全盘抛弃中国古代文论的主张,都有失偏颇,没有看到现代中国的特定历史任务和现实成果。我们不可能走复古之路,不只是因为古代中国文论有种种缺陷,而且是因为现代中国面临与古代中国迥然不同的新的内外局势和任务。文论的复古之声往往把对文论现状的不满统统归因于以往政策的失败,却没有看到,不少新问题恰是由于文论的成就而带来的新前景。对于这些新问题和新前景,复古论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反而导致问题的混淆或遮蔽。

第三,群体对个体的必要规范受到抑制。如果说建国以来头 30 年文论更注重个体对群体关系的归属感,并由于过于强调群体感而有时难免导致个体活力的丧失;那么,新时期 30 年文论则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强调个体自由、主体意识,发展到今天的状况,已经常常变得过于排斥群体对个体的必要的规范了。尤其是引入批判宏大叙事的后现代主义及后结构主义以来,中国现代文

论已很难再次找到能够凝聚人心的共通的理论话语了,这已直接影响到现代中国作为共同体的合法性,也必将进而影响到中国现代文论的建设之途。

第四,上层文学及文化传统被轻视。对个群关系的不妥当处理,会投射到上层文学与下层文学的关系问题。中国现代文论史不缺乏对下层文学的关注,这正是现代中国的一大优良传统。但是,目前文论界却存在以下层文学及文化之名抑制和贬低上层优良文学与文化传统的偏向。这尤其表现在当前“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挑战之中。宗白华的“艺术意境”论等追求上层文化的诉求似乎被遗忘了,而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网络文学等受到非同一般的高度关注。它们并非没有价值,但因此而淡忘或鄙弃上层文学传统,那不仅仅是某一部分人的损失,而更是现代中国的整体价值系统的损失,是整个现代中国文明心灵空间的萎缩和沦陷。

第五,对物质与精神关系的处理出现僵化苗头。强调物质现实、抑制精神空谈,是“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论的一条基本经验。它帮助中国现代文论成功地克服唯心论及唯意志论的偏颇,尤其是在新时期文论的拨乱反正过程中获得了较大成功。但这一经验毕竟有着特定的历史针对性和有效性。在现代中国的文明建设还需要更为开阔的精神空间和局面时,特别是在当前物质文明建设已经具备一定基础、需要更加生动活泼或悠扬高远的文艺来开辟或拓展精神境界时,过分执持于现实物质需要层面,势必缺乏昂扬开朗和独立自主的精神气度。确实,当前文论中存在过于关注实用层面的倾向,“文化研究”盲目扩张,有可能阻止面向更为高远舒缓的心灵空间拓展。这与文论中过分强调下层意识、抛弃上层文学及高雅文化传统的僵化思路有直接关系。

第六,过度推重艺术形式而弱化思想内容。虽然为了消除“文革”的巨大阴影和实现个体精神启蒙,文论界不无道理地一面消解与宏大叙事紧密相连的、思想内容制约艺术形式的旧套路,一面醉心于新的特异形式的创造和接受,但如果单纯为了形式美感而过分淡化思想内容,势必损害艺术的整体价值。当前文论往往在大力突出艺术形式的同时遗忘掉“现代中国”的精神指向和丰富内涵。最突出的体现,就是过于注重对对象的

形式分析而淡化其性质及价值分析。这也与当前中国文论界在引入西方当代文论时,缺乏对其进行基于中国历史主体立场的中国化考辨及辩证清理有关。

第七,外在知识制度有可能不是促进而是限制了文论的发展。当前的外在知识制度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估、专业技术岗位聘任、学术期刊等级划分和立项资助等方面有很多作为,但这些是否都有利于文论研究以及学术本身的发展,还是一个需要认真分析和反思的复杂问题。近年来,一些论者和社会公众就如何避免学术内耗、惩治学术腐败、抑制学术泡沫及减少学术急功近利等问题,发出了种种质疑、批评和改进的呼声,这些都是及时和有益的警醒。

#### 四、中国现代文论的未来思虑

对中国现代文论未来的忧虑和构想,既非凭空虚构的玄谈,也非全然与现实妥协的实用诉求。对中国现代文论的未来愿景展开建构,如同登临高山绝顶,由此回望与前瞻,才能同时对中国现代文论的既往足迹和未来指向做出相对清晰的判断和构想。下面不妨以建构现代中国文明为思考的中心,就中国现代文论的未来建设谈几点初步意见及建议。

第一,坚持以中化西的思想路线。以建设现代中国文明的目标和需要为主体,既敢于大胆和有分析地吸收有益于我的西方文论资源,也敢于大胆地摒弃那些不利于我的西方文论资源。在这方面,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表现出过人胆识,获得宝贵经验。即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经典,毛泽东也敢于将之中国化,不僵化、不教条,随物赋形地灵活运用于中国文论实践。显然,只有这样明确自身作为“现代中国”的历史主体,明确自身的历史责任,才能不盲信权威,不盲从时势,也才能自尊自重地屹立于世界文论之林。当前对于西方流行文论,需要同时深入分析西方社会的问题意识和理清中国社会的当务之急,只有这样,才能分清是非、分辨良莠,明确哪些东西对西方是良药、是美食而对中国却是毒药、是秕谷。西方后现代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理论中有关秩序解构思想的强调,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认识个体的独立,但如果不加分析地运用于中国社会分析,就可能不

适当地加重道德涣散、伦理冷漠的社会局面。以中化西,是对中国文论现代性的一次再度定性。这意味着中国现代文论既要全力顺应当今全球化新趋势,又要奋力显示中国文化自身的独特品格,也就是以全球化语境中现代中国的自体建构为基点,更加积极地融汇与化合西方文化、文论的影响,力求在全球化的世界上参照人类普适价值而确立中国现代文论的独特个性。

第二,弘扬以今活古的思想原则。有鉴于现代中国的特征虽然受到西方影响,但更主要地还是铭刻着来自古代中国的深刻印记并受到其思想的牢固牵制,因此,我们既不能无视中国古代文论的丰富的理论资源,又不能完全照搬它,而只能以现代中国的新需要去重新激活它们,从而遵循以今活古的法则。毕竟,现代中国要建设的是古代中国所不可能有的新格局。以今活古,意味着只有首先明确现代中国文明的目标和设计,才能在中国现代文论建设中确立自己对于古代资源的具体需要,以及具体方法和做法。宗白华等现代学者的文论思想堪称以今活古的典范。我们需要悉心洞察现代中国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心灵动向和情感需求,为其不断开辟出新的精神空间。

第三,灵活处理个群关系。从中国现代文论在个群关系上的变动历史看,我们在处理个人与群体关系时必须灵活、灵活再灵活。这关系到将来的文论是死水一潭还是生机盎然。我们需要警惕一放就散、一收就死的尴尬局面再度出现。一方面不能无限度地释放个体,导致混乱和一盘散沙,那将是中国现代文论不负责任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不能过度放纵行政的严密管制乃至全盘监控,那将导致文论枯萎、个性单调。如何焕发出个体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激励人们关注社会正义,是中国文论建设的一项长远任务。

第四,加强以雅导俗。要激励普通读者,就需要了解他们的文学趣味,关注他们的爱恨悲欢。但这并不等于说只能迎合公众的通俗或庸俗趣味。如果中国现代文论单纯为了迎合公众而决然抛弃上层文学的高尚性,那将使整个现代中国文明陷入无药可救的困境。一个平庸的社会怎么可能吸引人们全身心地热爱和投入呢?所以,在上层文学与下层文学关系的处理上,中国现代文论应当在提高自身高雅趣味的同时,积极参与、引导并逐渐影响和改变大众的喜恶。这就要求中国现

代文论不能抛弃高雅文学的研究,而是必须加强研究如何将大众性情引导向高尚品格。这不可能是个一劳永逸的工作,而是一门处理情境迥异、变化繁复的文论奇观的艺术。这本身也会焕发中国现代文论的活力和动感。

第五,既重物质现实而又趣味高远。正由于要灵活处理个群关系和大众情趣,中国现代文论还应注意,不能在物质与精神关系上僵化和教条,特别是不能只注重现实需求而不注重精神引导,那样会导致文论界陷入只关注日常审美及大众文化的琐细格局,而忽略精神审美及高雅文化。注重物质现实,并不意味着将目光低伏,而是要注重每一历史时刻情境的变化。在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大行其道,置人们的日常欢乐需求于不顾时,中国现代文论需要以人性论警告文坛,关注百姓的生活疾苦;在大众文化被市场化和商品化控制的历史时期,中国现代文论则必须坚守高雅品位,呼唤和引领人们奋身向前。后者正是中国现代文论建设要格外关注的。

第六,形式配合思想。在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关系上,从“五四”到新时期,中国现代文论发展过程中一直不缺乏注重形式感、乃至标举形式第一的理论思想,它们曾在中国现代文论史上有过一定的作用,但毕竟在百年文论史中无法升入主流。跟注重物质现实相似,中国现代文论主流历来注重思想内容远甚于语言形式,认为沉溺于形式的文论思想会导致个体从群体中孤立和分离出去。偏重形式的静穆优雅的艺术,对背负现代中国历史重担的主体来说,却仿佛成为一种不能承受之轻。为形式而形式,并非没有价值;在某些特殊历史时期,甚至是最有效的解毒剂。但如果将之作为中国现代文论的长远主导,则会有损于现代中国文明建设。所以,艺术形式并非不重要,但在中国现代文论中,却需要作为最重要的次要因素与作为主导因素的思想内容相匹配,共同完成现代中国的塑造和书写使命。

第七,知识制度保障学术健康发展。现代知识制度、特别是外在知识制度的建立应当为学术自律、学术发展服务,而不是相反。应该努力在维护制度权威与坚持学术自由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以便尽可能维护和完善内在知识制度,促进学术健康发展,真正让知识制度成为学术的保障而不是限制。

(下转第75页)